

# 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僧尼人口的增长及原因探析

杨 发 鹏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兰州 730070)

**摘 要:**僧尼人口的增长是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佛教发展繁荣的一项重要表现。本文通过敦煌文书中关于僧尼人口的若干记载来探索这一地区当时僧尼人口的变化轨迹,并对其增长原因进行分析。

**关键词:**僧尼人口;晚唐五代;敦煌

中图分类号:C9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09)02-0124-05 收稿日期:2008-11-04

**作者简介:**杨发鹏,男,甘肃临洮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佛教历史地理。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敦煌地区的佛教评价甚高,认为古代敦煌地区的佛教在全国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敦煌地邻西域,是汉地接受佛教最早的地区之一,它也一度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佛教文化,在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到了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佛教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其中僧尼人口的增长就是其发展繁荣的重要表现之一。本文试图通过敦煌文书中关于僧尼人口的若干记载来探索这一地区当时僧尼人口变化的轨迹,并对其增长原因进行分析。

对于历代全国僧尼人口,史籍的记载不多,对于各个地区的僧尼人口,记载更如凤毛麟角,这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幸运的是,敦煌文书中却保存着敦煌及其他一些地区僧尼人口的信息,有赖于此,我们才能得知当时敦煌及其他一些地区僧尼人口的真实数据。

日本学者藤枝晃<sup>[1]</sup>、池田温<sup>[2]</sup>、国内学者唐耕耦<sup>[3]</sup>、郑炳林<sup>[4]</sup>等先生曾经利用敦煌文书对吐蕃、归义军时期(公元786—1036)的敦煌僧尼人口做过研究,解决了不少问题。然而由于这些记载僧尼名籍的卷子许多残缺不全,所以仍然有许多问题如某些卷子的年代、僧尼数量等前人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他们以前得出的结论有些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所以也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 一、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僧尼人口增长

### 1. 吐蕃统治时期(公元786—848年)敦煌地区

的僧尼人口

公元786年,吐蕃占领敦煌,到公元848年张议潮领导瓜沙民众推翻吐蕃统治,吐蕃统治敦煌的时间大约为60多年。这一时期,在吐蕃政权的保护和扶植下,敦煌地区的佛教迅速发展。

吐蕃统治敦煌初期,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规模较小,根据敦煌文书S.2729《吐蕃辰年(788)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辨牒》<sup>[5]</sup>的记载,沙州有寺院13所,僧139人,尼171人,僧尼合计310人,其中永安寺有僧11人,大乘寺有尼44人,普光寺有尼47人。该件文书写于吐蕃占领敦煌的第三年(788年),是敦煌僧尼人口的最早记载,也是僧尼籍中最为完整的一件,它对于每一寺院僧尼的姓名、各个寺院的僧尼数、僧尼总人数都有明确记载。

S.5676《沙州诸寺僧尼数》<sup>[6]</sup>没有年代的记载,记有寺院15所,比前件文书少了乾元寺与潘原堡,但又多出了永康寺、莫高窟、安国寺、圣光寺4所。或许乾元寺与潘原堡并没有消失,只是变换了名称成为后面多出来四所中的两所。寺名与S.2729中相同的有的人数增加了,有的人数减少了。但这15所寺院僧尼合计427人,比前件文书的总数多了117人,总体上有所增长,增幅约为38%。因为这个僧尼总数与增幅与后面将要谈到几件文书的总数和增幅相比较变化不算太大,因此可能仍为吐蕃初期的统计,但它比S.2729的年代(788)要晚一些。

吐蕃统治中期关于僧尼人口的籍簿大都残缺不

全,只能看到少数几所寺院的僧尼人数,但从中大致可以看出敦煌僧尼人口增长的情况。P.5579《吐蕃酉年(805)大乘寺寺卿唐迁进具常寺应当道场六十二人牒》<sup>[7]</sup>载大乘寺有尼62人;S.545背1《吐蕃戌年(806)永安寺寺僧惠照具常寺应管主客僧名数状》<sup>[8]</sup>载永安寺有僧36人;P.3600《吐蕃戌年(806)普光寺等具常当寺应管尼数牒》<sup>[9]</sup>载普光寺有尼127人。上述三件文书的年代都有明确的记载,一件为805年,另外两件为806年,时间间隔仅有一年。为了后面计算的方便,我们把它们都看作是公元806年的抄件。大乘寺尼数比公元788年的44人增加了18人,增长幅度为41%;永安寺僧数比公元788年的11人增加了25人,增长幅度为227%;普光寺比公元788年的47人增加了80人,增长幅度为170%。三所寺院的平均增长率为146%。若以146%的增长率计算,到吐蕃中期(806)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应在吐蕃初期(788年)310人的基础上增加到大约762人。若以P.5579、S.545背1、P.3600三件文书中的数字与S.5676文书中相同寺院作比较,大乘寺增加了1人,增幅为0.16%,永安寺增加了19人,增幅为111.7%,普光寺增加了70人,增幅为122.8%,三所寺院的平均增幅约为78%。若以78%的增长率计算,S.5676中的427人到吐蕃中期应为760人。这个结果与以S.2729中数字计算的762人几乎相同,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吐蕃中期(806年)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在760人左右。

通过这些数字与增长率我们还可以推估出S.5676文书的大致年代。S.2729的年代为公元788年,僧尼人口为310人,到公元806年,僧尼人口增长到760人。这期间经历了18年,僧尼人口增加了452人,平均每年增加25人。S.5676中的僧尼人口为427人,比公元788年的310人增加了117人,以每年平均增加25人计算,增加117人需要4.68年,也就大约5年的时间,公元788年再过上5年,即为公元793年。从S.5676中的427人到P.5579中的760人,共增加了333人,以平均每年25人的增长速度,增加333人大约需要13年。公元806年减去13年,恰好也是公元793年。因此我们可以得知S.5676《沙州诸寺僧尼数》的年代应为公元793年。

吐蕃后期敦煌僧尼人口文书中没有记载,但它应当在原来基础上有所增加,到其统治末期,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估计在1000人左右。

## 2. 归义军时期(公元848—1036年)敦煌地区的

## 僧尼人口

公元848年,沙州土豪张议潮乘吐蕃内乱率众起义,赶走了吐蕃节儿,建立了汉族人领导的归义军政权。归义军时期,敦煌僧尼人口在原来吐蕃僧尼人口的基础上持续增长。S.2614背《唐年代未详(895?)沙州诸寺僧尼名簿》<sup>[10]</sup>前后均残缺不全,其中前面可能缺失三所僧寺的人名与数量,后面虽然也有缺失,但僧尼人口总数完整。该件文书载敦煌十七所寺院有尼693人,僧尼共计1140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编者唐耕耦先生将这件文书的年代有所怀疑地定为公元895年,但没有指明原因。895年应该是张氏归义军后期,然而这个时间的确定恐怕有误。这件文书的正面是《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其尾题为“贞明七年辛巳岁四月十六日净土寺学郎薛安俊写。”贞明为后梁末帝朱瑱的年号,贞明七年即公元921年,其时正是曹议金任节度使期间(915—935年在任),因此S.2614背的抄写时间不可能早于921年。

S.2669《年代未详(865—870)沙州诸寺尼籍名簿》<sup>[11]</sup>亦前后残缺不全,其中仅载大乘寺有尼209人,圣光寺有尼79人。该件文书中大乘寺与圣光寺尼的人数比S.2614背中同两所尼寺的人口又有了较大增加,根据这一时期敦煌僧尼人口逐步增长的事实,S.2669统计的年代应当在S.2614背之后,然而唐耕耦先生将此件文书时间定为865—870年恐怕也有问题,它至少也应在921年以后。S.2669中大乘寺尼的人数比S.2614背中同一寺院的173人增加了36人,增长幅度为20.8%,圣光寺比原来49人增加了30人,增长幅度为61.2%,两寺的平均增长率为40%。如果以平均40%的增长率计算,S.2669中的僧尼人口将要在S.2614背中1140人的基础上增加到1596人,也就是说该件文书中僧尼总人口在1500—1600之间。这个数字可能就是曹议金统治末期敦煌的僧尼人口。郑炳林先生根据P.2704《后唐长兴四至五年(933—934)曹议金回向疏》中时任归义军节度使的曹议金的两次斋僧人数,推测当时敦煌有僧尼人口1500到1600左右。<sup>[12]</sup>该件文书记载,长兴四年十月九日曹议金举行的一次法会上就“斋僧一千五百人供,度僧十七人”;到长兴五年五月十四日法会中,“请大众转经一七日,设斋一千六百人供,度僧尼二七人。”<sup>[13]</sup>看来郑先生的这个推断是可信的,同时也可以推断S.2669号文书的统计年代当在曹议金统治敦煌末期,即公元934年左右,唐耕耦

先生所定的公元865—870年是缺乏根据的。

郑先生还根据莫高窟469号洞窟中的墨书题记,推断到曹元忠时期,敦煌地区的僧尼规模从1600人增加到2000人左右。<sup>[14]</sup>这条题记曰:“府主太保就窟上造两仟仁(人)斋,广顺三年岁次癸丑八月十五日。”<sup>[15]</sup>广顺三年为公元953年,时任归义军节度使者为曹元忠。根据P.2704号文书的记载,曹议金在长兴四年的法会上度僧17人,在长兴五年的法会上度僧25人,平均每年度僧22人。广顺三年(953)距长兴四年(934)一共19年。若以每年度僧22人计算,这19年共度僧418人,也就是说这19年在长兴四年(934)年1600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418人。以长兴四年的1600人再加上418人,可以计算出光顺三年(953年)的僧尼人口为2018人,考虑到每年也有年老病死者,因此到光顺三年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应该接近2000人。这一数字与莫高窟469号洞窟中的墨书题记中曹元忠斋僧2000人的记载大体吻合,根据当时敦煌地区僧尼人口不断增长的趋势,到曹元忠时期达到2000人完全是有可能的。

### 3. 吐蕃到归义军时期敦煌僧尼人口的变化趋势

通过以上几件文书提供的数据及推算出来的数据,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从吐蕃到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僧尼人口一直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中间没有出现反弹的现象,只不过有时候增长快,有时候增长略为缓慢。从吐蕃初期的310人,到曹元忠时期的近2000人,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僧尼人口增长了5倍多,这个增长速度极为迅速,它基本上呈直线上升的态势(如图1所示)。

然而同一时期敦煌地区的总人口变化不大,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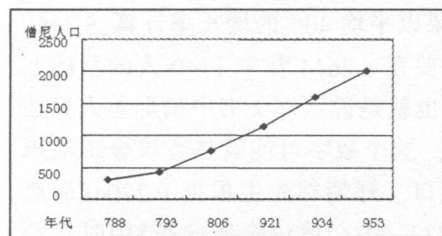


图1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僧尼人口变化曲线

乎在两、三万人左右,最多当不超过四万<sup>[16]</sup>。由于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总人口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因此我们不能计算僧尼人口在各个时期占总人口的比率,但若以总人口两万计算,敦煌僧尼所占人口在归义军时期比重大约在10%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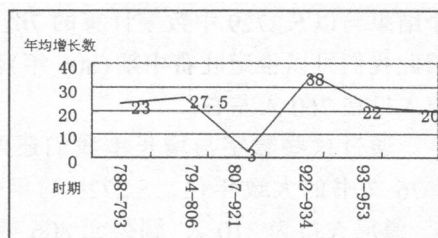
### 4. 吐蕃到归义军时期敦煌僧尼人口的增长特点

敦煌僧尼人口在吐蕃归义军时期一直呈现增加的趋势,但在不同阶段,增加的快慢有所不同。在吐蕃初期的788年到793年,僧尼人口从310人增加

到427人,5年时间增加了117人,平均每年增加23人;从794年到806年,僧尼人口从427人增加到767人,12年间增加了333人,平均每年增加27.5人;从吐蕃中期的806年到曹议金归义军初期的921年,僧尼人口从760人增加到1140人,114年间只增加了378人,平均每年只增加3人多一点;从曹议金初期的922年到他统治末期的934年,僧尼人口从1140增加到1600,12年间增加了460人,平均每年增加38人;从曹议金末期的935年到曹元忠统治的953年,僧尼人口从1600增加到2000人,18年间增加了400人,平均每年增加22人。这样我们可以看出,吐蕃初期到中期的几十年里,敦煌僧尼人口增长很快,平均每年增加20人以上;曹氏归义军时期,僧尼人口也增长很快,平均每年增加也在20人以上;而从吐蕃统治后期到张氏归义军统治结束的100多年里,敦煌僧尼人口增长缓慢,平均每年只增加3人。这样整个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僧尼人口的增长速度呈现马鞍形的趋势,即两头增速快,中间增长速度缓慢。另外,两头增速快的年限较短,前期有确切年代的是788—806段,计18年,后期有确切年代的是921—953段,计32年,这两段时间加起来一共才50年,而增速缓慢的中间部分却长达115年。(图2)

敦煌僧尼人口增速两头快、中间慢,首先与张议

潮建立归义军政权初期整顿寺院财产、沙汰伪滥僧尼有关。其次是从吐蕃后期到张



氏归义军时期,敦煌的政局并不太安定。先是张议潮起义驱逐吐蕃,建立政权以后又积极向外用兵,以后又有张淮深遇害,张承奉与回鹘的战争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从而导致这一较长时期内敦煌缺乏安定的社会环境,因此僧尼人口的增长就自然缓慢。而吐蕃前期与曹氏归义军时期,恰好是敦煌社会相对安定的两段时期,因此僧尼人口在这两个时期增长较快。

### 二、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僧尼人口快速增长的原因

敦煌的僧尼人口在吐蕃归义军时期呈现快速增长,在两百多年里增长了好几倍,远远超出其总人口增长的态势,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一地区僧尼人口大幅度增加呢?概括起来,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 1. 敦煌地区信仰佛教的传统



敦煌地邻西域,是汉地接受佛教最早的地区之一。《魏书·释老志》载:“凉州自张轨以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sup>[17]</sup>由于敦煌独特的地理位置,凡是天竺、西域来内地传教的高僧,河西、中原往西域、天竺求法的行者,无不途经或驻锡敦煌。敦煌的佛教不仅起步早、发展快,而且在隋唐以前就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自西晋以来,敦煌就名僧辈出,如敦煌菩萨竺法护、于道邃、单道开、竺昙猷、释道法、释法颖、释超辩、释慧远等都驰誉一时。十六国时期,敦煌曾一度设立译场,翻译佛典。莫高窟不仅开凿年代早、规模大,而且艺术精湛。当时敦煌就全国而言,也算得上是一个佛教中心。由于上述诸多有利于佛教发展的条件,以及良好的历史传承,再加上此时敦煌佛教已经历了六、七百年的发展,佛教信仰早已深深扎根于敦煌民众的心灵之中。咸通十年(869),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给唐朝的奏文(P.3720-2)中说到:“切以河西风俗,人皆臻敬空王,僧徒累阡(千),大行经教。”<sup>[18]</sup>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敦煌民众对佛教信仰深厚的历史传承。由于传统的信仰,使得敦煌民众乐于出家为僧为尼。

## 2. 吐蕃、归义军历任统治者的信奉与支持

这一时期敦煌地区僧尼人口迅速增加,与当地历任统治者的信奉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公元786年,敦煌在吐蕃围攻长达十年之久以后,以“勿徙他境”为条件投降吐蕃,从而开始了长达六十多年的蕃占时期。吐蕃之所以没有强行以武力攻占敦煌,其目的是为了不使敦煌的佛教遭受战争的破坏,因为当时的吐蕃统治者非常崇信佛教。吐蕃占领敦煌后,在吐蕃政权的保护和扶植下,当地的佛教迅速发展。这一时期,有组织的抄经活动使寺院的经藏大为丰盈,出现了昙旷、摩诃衍、法成等蕃、汉高僧,他们有的专心著述,有的传扬禅法,有的译经讲道,使敦煌的佛教教学水平达到空前高的地步。<sup>[19]</sup>大规模的翻译、抄经活动,必然需要为数不少的僧人参与;高僧开展宏扬佛法、讲经布道的活动,必然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僧尼队伍中来,因此这一时期寺院、僧尼数量的增加是必然的。

公元848年,张议潮乘吐蕃内乱,率领瓜、沙民众赶走走儿,推翻吐蕃统治,建立了归义军政权,并由他本人出任归义军第一任节度使。作为首任节度使的张议潮深受佛教的影响,他的青少年时期即在寺院中学习、生活,敦煌文书中保存有他抄写的《无

名歌》(P.3620),尾题“未年三月廿五日,学生张议潮写。”<sup>[20]</sup>另外还有《大乘稻芊经》(S.5835),尾题“清信佛弟子张议潮书”。<sup>[21]</sup>由于出身寺院、受佛法影响的缘故,张议潮对佛教自然有特殊的感情。在他建立归义军政权后,就确立了以都僧统为首的僧官制度,并与都僧统一起调查了管内十六所寺院和三所禅窟的僧尼、常住百姓和常住物,制成各种名籍、帐簿,宣布保护寺院所有的常住百姓、常住物不得侵夺等。张议潮在四处征战的间隙,于咸通六年(865)前后,在莫高窟开凿了大型的功德窟(156窟)。<sup>[22]</sup>张议潮之后,其侄张淮深成为归义军的实际最高统治者,他也是一位热心佛教事务的人。他在任期间,增修了莫高窟北大像(96窟),并在其侧修建了自己的功德窟,另外还对河西都僧统的官寺龙兴寺做了修复。

公元914年,曹议金取代张承奉任归义军节度使,成为曹氏归义军的开创者。他本人也是一位热心佛教事务的人,他除了象他的前任一样开窟造像、写经布施以外,还经常度僧尼出家。根据前引P.2704《后唐长兴四至五年(933—934)曹议金回向疏》中的记载,曹议金在长兴四年就“斋僧一千五百人供,度僧十七人;在长兴五年“请大众转经一七日,设斋一千六百人供,度僧尼二七人。”也许由节度使主持的剃度僧尼的活动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只是文献没有保存下来而已。曹议金的继任者曹元德、曹元深、曹元忠等,也大都热心奉佛,他们大概每年也要举行一次象他们的前任一样的剃度僧尼的法会。

由于吐蕃与归义军历任统治者对敦煌佛教的保护与支持,促进了敦煌地区佛教的快速发展,更由于由当地最高统治者主持的设斋布施和剃度僧尼的活动,成为敦煌地区僧尼人口快速增长的直接原因。

## 3. 敦煌民众离俗出家是一种普遍现象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僧尼人口的快速增长,除当地的佛教传统和历任统治者的热心支持外,更离不开当地民众的热情支持和积极参与。他们或布施写经、或捐资开窟、或投劳修寺、或行香燃灯,总之,凡是一切佛事活动民众大都能热情支持、积极参与,这在敦煌文书中有大量记载,兹不赘述。除了这些具体的支持与参与外,他们中的一些人干脆落发为僧尼。对于各家各户出家为僧尼的情况,敦煌文书中也有一些相关的记载。

根据京都有邻馆藏敦煌文书51号《唐大中四年(850)十月沙州令狐进达申报户口状》<sup>[23]</sup>记载,令狐进达家应管口妻、男女、兄弟、姊妹、新妇、僧尼、奴婢

等共34人,僧尼共有7人,僧尼占全家人口的比例为20%。S.4710《唐年代未详(九世纪后期)沙州阴屯屯等户口簿》<sup>[24]</sup>记载五户:第一户失名家中12口,其中有僧尼3人;第二户阴屯屯家21人,其中僧尼4人;第三户张猪子口6人,尼1人;第四户王鹰子口8人,僧1人;第五户刘再荣口28人,有僧尼7人。这五户75口人僧尼共16人,僧尼占人口比例约为21%。P.4989《唐年代未详(公元九世纪后期?)沙州安善进等户口田地状》<sup>[25]</sup>残留的三户户籍田簿中,安善进一户8口中有3人出家,张孝顺一户3人无人出家,傅兴子一户10口有1人出家。这三户21口人中共出家4人,僧尼比例为19%。这三件文书中僧尼人口占六户总人口的比例平均约为20%,也就是说每户人家中每5人就有1人出家为僧尼,这个比例是相当的高。当然就这三件文书中僧尼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显得有些过高,并不意味着整个敦煌地区每家都有这么高的比例,但至少说明当时敦煌地区民众出家为僧尼是一种普遍现象。

敦煌民众出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除了对佛教的真诚信仰外,他们各自的动机不尽相同。世家大族中的成员出家有些可能是为了攫取教权,而贫苦

百姓出家有些则可能是生活所迫,限于篇幅的关系,在此不作详论,但无论怎样,由于他们积极落发出家,促成了敦煌地区僧尼人口的快速增长。

敦煌地区僧尼人口快速增长的原因很多且比较复杂,以上仅举其要者而言之。✿

#### 参考文献:

- [1]藤枝晃.敦煌の僧尼籍[J].东方学报(京都)(第29册)1959:285-338.
- [2]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M].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605-611.
- [3][5][6][7][8][9][10][18]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M].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1990:194-257,194-204,249,206,208,209-213,229-245,32.
- [4][12][14]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人口变化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4(12).
- [13]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M].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1990:85-88.
- [15]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M].文物出版社,1986:178.
- [16]齐陈骏.敦煌沿革与人口[C]//河西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73-97;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人口变化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4(12).
- [17](北齐)魏收.魏书[M].中华书局,1985:3032.
- [19][22]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68.
- [20]黄永武.敦煌宝藏(第129册)[M].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321.
- [21]黄永武.敦煌宝藏(第44册)[M].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500.
- [23][24][25]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M].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1990:462,470,471.

### The Growth of Dunhuang Population of Buddhist Monks and Nuns in the Period of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as Well as Its Growth Reasons

YANG Fa-peng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population growth of Buddhist monks and nuns is an important performance of Dunhuang Buddhist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in the period of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Based on Dunhuang Documents in the population of monks and nuns, to explore the changing tracks of the population of monks and nuns in this region at that time and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its growth.

**Key words:** The population of Buddhist monks and nuns;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Dunhuang

(上接 123 页)

### The population policy of Korea and its' lessons for rural China

YAO Xing-yun<sup>a</sup>, FU Shao-ping<sup>b</sup>

(a. College of Humanities, b. College of Humanities,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nxi, 712100)

**Abstract:** Korea has undergone a change from family planning policy of curbing population growth to new population policy of encouraging population growth. The population policy of Korea was successful in curbing the population boom and alleviating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the population and economy, social resource, environment. However, it also caused a series of social problems, including the growing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high sex ration. The above mentioned problems are being staged in rural China. If China could learn to lay down the law before every unveil fresh policy, make significant efforts to develop the social utility, use economic levers flexibly, which are the experiences of Korea, it will be beneficial to maintain a low birthrate, restrain the sex ration imbalance and aging of population and so on.

**Key words:** Korea; population policy; lessons